

基于文献视角的海外对华投资和 中国对外投资的比较

杨博飞¹ 朱晟君¹ 高菠阳²¹

(1. 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 中国 北京 100871;

2. 中央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中国 北京 100081)

【摘要】: 现阶段,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不再只是全球主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国 (IFDI), 还成为了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来源国 (OFDI)。在此背景之下, 文章分别从投资动因, 空间分布格局以及投资与区域发展等三个研究主题对现有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的研究进行综述, 并着重对比分析三个研究主题下两类不同海外投资——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研究关注点和实证发现的异同。文章主要发现如下: (1) 中国对外投资动因不仅具有主流海外投资 (海外对华投资) 的一般性还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具体体现在中国对外投资并不完全是在优势建立后的海外扩张, 更多情况下是获取关键资源以提升国内竞争优势和实现政治战略意图为目的的重要手段。(2) 两类海外投资的时空格局都经历了由高度集聚逐渐趋向均衡的过程, 但是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却有所差异。相比而言, 劳动力等传统区位因子对海外对华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大, 而在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不仅传统区位因子, 关系因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3) 两类海外投资对于区域发展的影响机制不同, 但都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而空间异质性的来源为中国各区域发展基础的差异以及海外投资目的国 (来源国) 间的国别差异。最后, 文章在综述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未来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研究的新方向。

【关键词】: 投资动因 投资区位 经济全球化 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 (2021) 05-0122-12

2000 年加入 WTO 之后, 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开始起步。经历了 20 年的发展, 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从数据来看, 2002—2018 年期间,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规模在海外对华投资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FDI) 和中国对外投资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两方面都增长明显 (图 1)。

对比分析可以看出,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 2002—2008 年, 这一时期中国吸引了大量的海外对华直接投资, 并逐步成为世界重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国之一。虽然在同一时期,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有所增加, 但是整体规模相对较小。第二个时期为 2008—2018 年, 这一时期中国吸引的海外对华投资规模依旧保持增加, 但是增速却逐渐放缓, 而对外投资规模则表现出明显增加, 并且从 2011 年开始, 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一直保持在世界前三。值得注意的是, 2014 年, 中国对外投资规模首次超过海外对华投资规模, 成为海外投资资本净输出国。虽然 2016 年之后, 受中国对外投资回归理性和逆

作者简介: 杨博飞 (1993-), 男, 贵州贵阳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和金融地理。E-mail: yangbf@pku.edu.cn
朱晟君 (1984-), 男, 安徽淮北人, 博士, 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产业升级、全球化与区域发展。E-mail: zhus@pku.edu.cn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971154、41701115、418711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41731278)

全球化思潮抬头下全球对外投资水平下滑的双重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但就全球来看，中国仍旧是全球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由此看出，2011 年以后，中国不再只是全球重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国，还逐渐成为全球重要的海外投资输出国^[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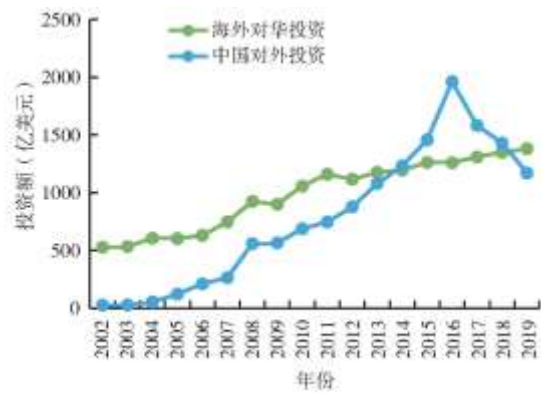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情况 (2002—2019 年)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在双向海外投资规模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的空间分布格局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3]。首先来看海外对华投资，2003—2018 年，中国地级市所吸引的海外对华投资基尼系数由 2003 年的 0.79 下降到了 2014 年的 0.72, 2014 年之后，基尼系数一直处于 0.72 左右波动的态势。由此看出，在中国各地级市间，海外对华投资的空间分布格局经历了一个从集聚到逐渐扩散并保持相对稳定的变化过程。同样地，中国对外投资的空间分布格局也呈现出类似的空间扩张趋势。2003—2018 年，中国对外投资所覆盖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由 2003 年的 139 个增加到了 2015 年的 188 个。并在此之后，覆盖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一直维持在 188 个左右（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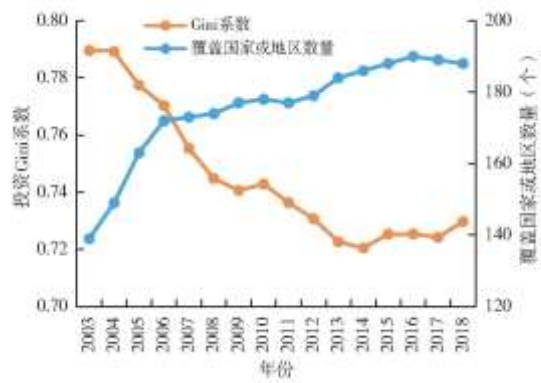


图 2 2003—2018 年中国各城市海外对华投资基尼系数以及中国对外投资覆盖国家或地区数量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在此背景之下，近 20 年来，中国双向海外投资成为了地理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4-9]。相关文献所关注的重点研究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类：(1)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主体投资动因分析^[6,10]；(2)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的时空分布趋势及其影响因素^[2-4,9]；(3)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机制^[11-12]。

虽然从研究主题上看,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的相关研究所关注的重点问题相类似,但是两类研究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和切入点却存在较大差异。在研究海外对华投资时,中国是海外资本投资的接受者,并且在大多数研究中海外对华投资往往被认为是促进中国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11,13]。因此,相关研究所讨论的主题为解析海外跨国企业对外投资动因和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10,14-15],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各区域应该如何吸引海外投资的进入以及如何利用海外对华投资促进本地发展^[11,16-17]。而在讨论中国对外投资时,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则转变成了海外资本投资的提供者,相关研究主要讨论的内容为中国如何选择海外投资目的地^[18-20]以及中国对外投资对中国各区域和目的国发展带来的影响^[12,21]。

然而目前尚未有研究针对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的上述异同系统地进行梳理,大多数研究主要以海外对华投资或者中国对外投资为研究对象分别论述中国双向海外投资与其他国家海外投资的异同^[10,22]。结合中国现阶段发展实际,积极吸收海外对华投资和继续主动对外投资都将长期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重要形式。在此背景之下,深入认识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间的异同,无论是对于长期指导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实践还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双向海外投资间的空间互动都能提供科学的实证参考。基于此,本文将通过系统梳理现有关于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的研究,着重对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在投资动因、投资空间区位特征以及各自促进区域发展机制等方面的异同进行归纳总结。

1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动因

综合世界各国的投资实践来看,跨国企业是各国进行海外投资的主要行为主体,因此当前研究在分析海外投资动因时以分析跨国企业海外投资行为的动因为主,并从两部分对其进行解构:一是讨论跨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所具备的优势条件。相关研究认为只有当跨国企业已经建立一定优势之后,企业才具备进行海外投资的潜在动力。二是分析跨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目的。

目前被广泛运用于解释跨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动因的经典理论为 Dunning 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企业同时在所有权 (Ownership)、内部化 (Internalization) 和区位优势 (Location) 等方面都具有优势并且这些优势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海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相关的成本时,跨国企业就会进行海外投资^[23]。而跨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资源获取、需求合作等形式将资本配置到投资效率最优的地理区位。

在海外对华投资的研究中,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被广泛借助于解析海外跨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行为^[24-25]。相关研究认为由于中国所吸收的对外投资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因此海外对华投资动因与大部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流投资动因类似,即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在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之后通过大规模向中国投资以获取中国各地区低廉劳动力和市场^[26]。

但是,关注中国对外投资的研究却发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难以全面解释中国对外投资动因^[22,27]。其原因在于中国对外投资的实践主体与传统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范式下的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中国企业往往并不是在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等各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的条件下进行海外投资,尤其是民营企业^[28]。在更多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仅在某一方面具有优势^[29]。二是从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来看,国有企业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绝对主力^[19],由于国有企业所有制的特殊性,其在进行海外投资时会受到地方或中央政府的强烈干预,使其对外投资不仅要满足自身发展的经济目的,还要满足背后地方或中央政府的政治意图^[30]。

为深入剖析上述差异导致中国对外投资动因存在其特殊性的原因,相关领域的学者在传统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解释框架下引入了二元性理论 (Ambidexterity theory)、制度理论 (Institutional theory) 和资源基础理论等新研究视角^[31-33]。基于二元性理论视角的研究认为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中游”位置。因此区别于传统对外投资中主要是由拥有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流向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单一流向”情境,中国对外投资存在两种流向:一是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顺向对外投资,二是流向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中国企业进行两类对外投资时所依托的优势条件和投资目的间

的差异使得中国对外投资具有与传统对外投资相异的二元性^[34-36]。具体而言,在进行顺向对外投资时,因为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中国企业在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都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所以中国企业主要还是利用这些传统优势进行海外投资。而在进行逆向对外投资,中国企业在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等方面都不具备明显的优势,甚至处于劣势,此时中国企业通常会选择利用其在培养、维护和利用外部业务利益相关者(例如竞争对手、政府、供应商和分销商)的关系方面的独特能力和优势,即关系优势来弥补其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在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势^[37]。

基于制度理论视角的研究提出区别于海外对华投资多受市场因素影响,制度因素也是影响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38-39],但现有研究对于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投资促进机制的解读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制度规避,支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认为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当前中国所存在的法律体系不成熟、市场竞争不充分等制度不足导致部分中国企业希望通过海外投资将生产活动布局到其他国家以寻求更为完善和成熟的制度环境^[31]。另一种观点是制度促进,该观点认为中国各级政府很愿意也很积极参与到本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中来。在此背景下,中国各级政府会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来扶植和鼓励从而促进企业进行海外投资^[40],而在此促进机制之下,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可能因为带有一定的政治战略意图,而并非完全以追求投资利益最大化为投资目标。

此外,部分学者还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视角出发提出相较于获取目的国的劳动力和市场,中国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的目的更可能是为了获取战略性资源。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可能并没有利用或强化自身现有的竞争优势,而是更可能试图解决自身存在的竞争劣势^[41]。换句话说,开拓海外市场以提升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并非是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其主要的目的更有可能在于通过投资从海外获取关键性的互补资源、学习先进知识来培育自身更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以增强自身在国内的发展优势^[42]。

综上所述,中国对外投资不仅具有主流对外投资(海外对华投资)的一般共性,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22],即由于投资主体和国内制度环境的差异,中国对外投资并不仅仅只是在完全具备各种优势之后的全球扩张,而更多的是以获取关键性发展资源和满足政治意图为目的的战略手段。

2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时空格局

当前中国双向海外投资时空格局的研究主题分为两类:一是描述性分析中国双向海外投资时空格局的特点及趋势;二是在总结相关区位理论的基础之上利用计量模型来解释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2.1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时空分布

本文根据不同时期中国双向海外投资时空分布特征的实证研究结果以及对应时期的统计分析情况(图3),大致将中国双向海外投资时空演化过程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90年代到21世纪初,这一阶段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的整体规模都较小,且在空间上都表现出高度集聚。2002年,东部地区吸收的海外对华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为86.23%,而中西部地区所吸收的海外投资分别只占到全国的10.94%和2.83%。相关实证研究也指出在这一时期,中国超过90%的海外对华投资集聚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带和沿长江流域的“T”型轴线上^[4]。而同一时期,中国超过60%的对外投资都流向了英美等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而对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较少^[43]。

第二个阶段大致为2002—2008年,也就是中国加入WTO的初期。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的整体规模也随之大幅上升,尤其是海外对华投资。随着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同时增加,二者的空间分布格局也逐渐由高度集聚开始逐渐趋向均衡。一方面,大量海外对华投资的进入不仅继续提升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海外对华投资的集聚水平,尤其在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还同时扩散到了中西部内陆地区,使得中西部地区零星地出现了海外对华投资高度集聚的城市,如长沙、成都和重庆等城市^[44],2002—2008年,3个城市吸收海外投资的比重分别从0.5%、0.61%和

0.43%上升到1.2%、1.49%和1.81%。另一方面,在这期间,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规模显著增加,并逐渐超过了对发达国家投资的总体规模。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投资新增的热点投资地区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大洋洲和非洲地区的国家,而非地理位置相对邻近的亚洲国家^[30],2002—2008年,中国对大洋洲和非洲的直接投资占比分别从1.17%和2.59%,上升到3.49%和9.82%。而对除中国香港以外的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占比则从12.07%下降到8.78%。

第三个阶段为2009年至今,在这一时期,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空间分布格局的均衡趋势进一步加大。在海外对华投资方面,由于金融危机和国内要素市场变化的影响,海外对华投资的规模虽然依旧保持逐年增加的势头,但是增速却明显放缓。从空间分布上看,中国各地区海外对华投资的分布更加均衡。虽然东部地区海外对华投资的整体规模优势依旧明显(2018年,东部地区吸收海外投资占全国比例为53.94%),但是中西部地区所吸收的海外对华投资比重上升明显,分别达到了33.83%和12.24%。尤其是湖北、河南、安徽等省份整体吸收海外对华投资规模上升明显。而在西部地区,虽然海外对华投资整体规模仍然较小,但省会城市的海外对华投资集聚水平增加明显,例如成都、西安和贵阳等城市^[3]。在中国对外投资方面,随着中国对外投资整体规模的大幅度增加,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主要的海外资本输出国(图3)。在这一时期,亚洲邻近国家开始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投资热点区域^[45]。2009—2018年,中国对除中国香港以外的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占比上升到了13.03%,是所有大洲中上升幅度最大的。

除了上述的空间演变趋势之外,中国对外投资的时空格局还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对外投资大量集聚于中国香港,2008年以来,中国对外投资中约有60%流向了香港。二是中国对外投资还大量集中于开曼群岛和维尔京群岛等“避税天堂”^[2],且近年来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2008—2018年,中国对外投资中流向开曼群岛和维尔京群岛的比例由6.49%上升到8.82%。

综上所述,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的空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0年之前,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开放程度较低,双向海外投资规模整体较小,空间分布上呈现出高度集聚的特征。第二阶段为2000—2008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开放程度逐渐提高,双向海外投资规模急剧增加,空间分布开始由高度集聚逐渐趋向均衡。第三阶段为2009年之后,中国双向海外投资规模不断增加的同时空间均衡的趋势也在进一步加大。

2.2 双向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现有地理学研究主要从集聚效应、传统区位因子、制度关系因子等角度讨论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因子^[10, 39, 46-47]。关注集聚效应的研究认为,海外投资的空间集聚具有“区域自我加速”机制^[4],即一个地区已经累积的海外投资会对新进入的海外投资起到示范作用,从而吸引新的海外投资进入到该地区^[48];关注传统区位因子的研究认为海外投资的空间区位选择是国家或企业对投资成本和收益综合考虑的一种理性反映^[49],并以此为依据强调市场、劳动力要素和自然资源禀赋等传统区位因子对海外投资空间布局的影响^[50-51];关注制度关系因子的研究认为目前中国尚处于转型期,在这一特殊的背景下,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将面临设施不完善和制度环境不稳定等情况^[30],这使得中国双向海外投资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面对这一情况,企业可以依托正式制度关系和非正式社会文化关系来减少其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降低海外投资风险。因此,制度关系因子在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过程中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38, 52]。

尽管影响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种类存在相似,但是两类研究对于各类因子的关注程度却存在明显差异。整体而言,在讨论海外对华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时,现有研究更关注集聚效应和传统区位因子的作用,而对制度关系因子则关注较少,而在讨论中国对外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时,制度关系因子则受到了更多的关注。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关注前者的研究主要讨论的是中国各次区域如何吸引外资,因此各次区域间的差异成为研究的重点;而关注后者的研究主要讨论中国如何选择海外投资的目的地,因此不仅各国家和地区间差异受到关注,海外投资目的地与中国间的相互关系也成为了主要考察的因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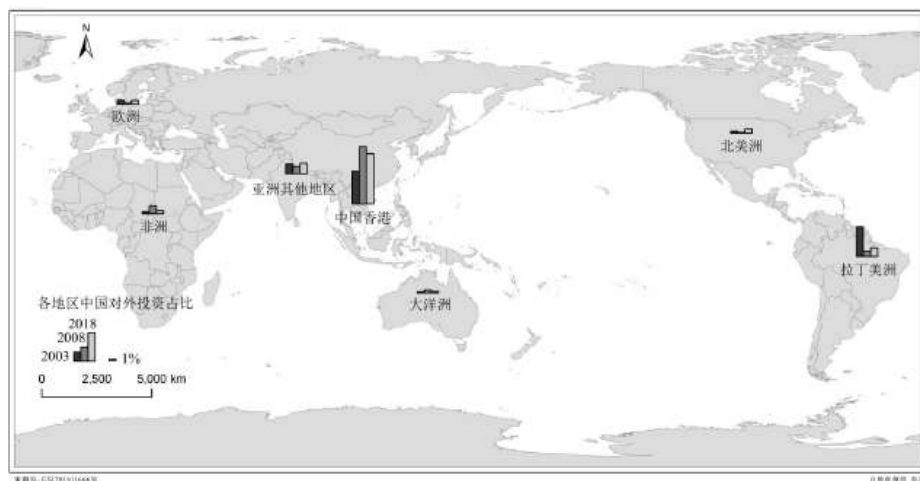


图 3 2003、2008、2018 年中国各地区海外对华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

具体而言：两类研究关注的差异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集聚效应在海外对华投资的研究中受到更多关注，在讨论海外对华投资区位选择时，超过 70% 的文章都对集聚效应对海外对华投资空间区位的影响进行了讨论，且普遍发现海外对华投资在选择投资区位时更倾向于选择外资的聚集区域，证明了“区域自我加速”效应的存在。而在讨论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时仅有不到 10% 的文章对集聚效应进行了讨论^[53-55]。虽然关注集聚效应的研究数量较少，但是也普遍发现先进入的对外投资所积累的市场信息和经验会影响中国新进入对外投资的空间区位选择^[54-55]。

其次，市场规模和劳动力要素等传统区位因子在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的空间区位研究中都受到了广泛关注，超过 80% 的研究都对这两个区位因子进行了讨论^[56-58]。但相比之下，对于区域自然资源禀赋的讨论则主要集中在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研究中，大部分关注区域自然禀赋的研究认为，自然资源获取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尤其是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9, 38, 59]，但是也有部分研究对这一论点进行了否定，认为从整体投资情况的分析结果来看，中国对外投资的自然资源获取动机并没有得到充分确认^[20, 60]。

最后，制度关系要素中的制度环境在两类研究中的受关注程度也都相对较高^[61-62]，但是两类研究中对于制度环境的测量指标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讨论海外对华投资时，现有研究多关注中国各次区域的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开放程度，而在讨论对外投资时，现有研究多关注目的国的政治稳定程度和政府治理水平。

相比之下，对于关系要素的关注程度在两类研究中却呈现较大差异。关系要素中，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文化关系等都在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研究中被广泛讨论，且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中国与海外投资目的地间良好的关系能够显著促进对外投资的进入^[47, 64]。而在海外对华投资区位研究中对社会文化关系的讨论较多，对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讨论较少。所涉及的研究主要关注内容是与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社会文化联系对于海外对华投资在华区位选择的影响^[65-68]。

除了关注程度存在差异以外，各类因子在对海外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同一类型的因子对于对两类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不同。具体而言，在传统区位因子中，市场和劳动力要素对于海外对华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的重要程度要大于区域自然资源禀赋^[69]，尤其是劳动力要素。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各区域在

起步阶段吸引对华投资的主要因素^[70]，但是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优化和发展阶段的改变，进入中国的海外投资质量逐年上升，使得其对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追求有所降低，因此，近年来区域劳动力的质量也逐渐成为海外对华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56, 71]。相比之下，区域自然资源禀赋则在中国早期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增加和相关制度的完善，市场和劳动力要素在影响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中的重要程度也在不断提升^[9]。

同样地，讨论制度环境对于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的研究普遍发现两类投资的空间区位选择对于区域制度环境的考虑存在差异。一般来说，区域制度环境越好越有利于吸引海外对华投资进入，虽然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地区都执行了类似的政策以吸引海外对华投资的进入，导致区域制度环境的优越性对对华投资的吸引力有所下降^[50]，但是海外对华投资更青睐进入制度环境较好的区域的事实并没有改变。而对中国对外投资的研究却发现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一部分研究发现目的国的制度环境对于吸引中国对外投资具有正向作用^[72]，而另一部分研究发现制度环境较差的目的国反而吸收了更多的中国对外投资。因为投资于政治相对不稳定的国家，可以让中国避免与发达国家的投资者竞争，获得更大投资的利润^[9, 73]。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对目的国的制度环境偏好的差异主要来源于投资主体的不同^[62]。一般来说，以经济利益为主要投资目的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投资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和地区，而国有企业由于其独特的所有权结构使得其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出于对政治目标的考虑，则不会将目的国的制度环境作为是否投资的主要考虑指标。

二是不同类型的因子间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对海外对华投资空间区位选择的研究发现，相较于社会关系因子，传统区位因子是海外对华投资空间区位选择的首要影响因素，尤其是市场规模^[15]。而制度关系因子则对于中国对外投资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大^[74]，尤其是政治关系和社会文化关系。虽然近年来，社会文化关系因子对于中国对外投资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但其依旧是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空间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2]。

3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与区域发展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与区域发展也是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相关研究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两个：一是讨论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对区域发展的作用机制^[75-77]；二是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对于区域发展促进机制的空间异质性检验^[78]。

3.1 作用机制

关于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如何促进区域发展的研究发现，对于不同类型的地区，不同类型的双向海外投资对区域发展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结合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双向海外投资普遍对于区域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2, 75, 79]，但是也有部分研究提出中国双向海外投资阻碍了区域发展^[80]。

具体来看，讨论海外对华投资与区域发展的研究主要关注海外对华投资如何促进中国各次区域的发展。现有研究提出海外对华投资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技术溢出和关联效应促进区域发展^[81]。首先，作为一种外部融资渠道，海外对华投资可以直接为中国各次区域提供金融资本支持，通过增加区域金融资本供给，缓解区域发展可能面临的金融约束^[75]。其次，海外对华投资还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中国各次区域发展。海外对华投资的进入不仅为中国本地企业提供了可以近距离学习和模仿外资企业先进技术、管理和工艺的机会，还让中国本地企业可以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发展，从而促进其发展^[82]。最后，海外对华投资还能通过关联效应促进中国各次区域的发展。海外对华投资进入区域后，通过与上下游企业产生联系形成生产关联。生产关联所具有的关联效应为本地企业带来了更多“干中学”的可能，从而促进区域发展^[76]。但是，也有部分研究提出海外对华投资并非都能促进中国各次区域发展。因为海外对华投资有可能产生技术依赖，造成技术锁定^[83]。此外，海外对华投资还有可能对中国各次区域发展产生挤压效应，例如，跨国公司凭借优厚的薪资待遇吸引中国的高素质人才，破坏中国各次区域原有的发展基础^[80]。

区别于海外对华投资，关注中国对外投资与区域发展的研究不仅关注中国对外投资如何影响中国各次区域的发展还关注其

如何影响目的国的发展。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对于中国各次区域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投资收益、资源补缺、逆向知识溢出等机制来实现^[84-86]。其中,投资收益是指,对外投资作为一种金融投资手段可以让投资方通过金融资本投资的形式获取直接经济收益^[84]。资源补缺是指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从海外市场获得其发展所需的关键性资源,以弥补自身的竞争劣势。大量实证研究发现,许多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并非是为了和当地的企业进行竞争,而是为了对自身发展所需关键性资源进行收购,然后将技术、品牌等无形战略资产汇回本国市场,以此来强化自己在本国市场中的竞争实力^[87-88]。逆向知识溢出是指企业通过海外投资,吸收被投资地区的知识,技术,促进投资国的区域发展。逆向知识溢出的实现主要通过研发互动、成果传递和内部吸收三个环节^[89]。首先企业通过绿地投资、合并收购和知识联盟等多种海外投资形式与海外企业、研发机构建立联系,形成研发互动。然后通过成果反馈、人员流动等形式实现研发成果的逆向传递。最后母公司通过对逆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新实现技术进步,从而提升自身发展水平。大量实证研究验证了中国对外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90-92]。

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还会对目的国的区域发展产生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进入可以通过提供金融资本、提升当地税收和增加就业机会等方式直接促进目的国的区域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的进入还能以合作开发或指导扶持等形式促进目的国的产业升级,促进当地发展水平提升^[93]。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对外投资对目的国发展的直接促进效果明显,但尚未与目的国的现有的经济活动形成良好互动,带动当地产业升级。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截至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累计为当地增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超过18万个就业岗位^[93]。但是从投资领域的分布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领域多集中在低端制造业领域,对当地科技研发、高端制造业等高端领域的投资较少,使得中国对外投资未能有效促进当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94]。由此看出,现阶段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虽然较大,但是从投资阶段来看,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投资方式的选择模式和投资项目管理方式上仍不成熟,存在一定的投机心理,同时未对当地的发展需求予以足够的重视^[20]。

3.2 空间异质性

关于双向海外投资对区域发展作用机制的空间异质性检验也是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整体来看,相关研究主要讨论了对于中国各次区域发展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而对于海外投资来源国(目的国)发展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着重对前者进行梳理和讨论。大量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对中国各次区域发展的作用机制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这种空间异质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区域异质性,二是国别异质性。

具体而言,关注区域异质性的研究指出中国各次区域在发展基础、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使得海外投资对于各次区域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现有研究对于区域异质性差异的解释为海外投资对于区域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门槛效应,即只有当区域的吸收能力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之后,区域才具备了吸收和转化海外投资所带来的积极效应的能力^[7]。与此同时,海外投资才具备促进区域发展的可能^[95]。实证研究发现,双向海外投资对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区域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于中西部地区创新发展则没有显著的影响^[96]。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东部地区人力资源水平相对较高,能够更好地实现对双向海外投资技术溢出的吸收和转化^[97]。此外,还有学者对区域吸收能力进行了分析,发现除了人力资源水平之外,区域经济开放程度^[98]、金融发展^[99]等因素也会影响区域吸收能力。李梅等综合分析了R&D强度、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技术差距、金融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等6个指标之后,发现R&D强度、人力资本是影响中国区域吸收能力大小的关键因素^[21]。

关注国别异质性的研究指出海外对华投资的来源国和中国对外投资目的国在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上的差异会影响双向海外投资对中国各次区域发展所起到的作用^[100]。一方面,不同来源国的海外对华投资对于中国各次区域发展的影响方式不一样,实证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对这一结论进行了验证,部分学者分析海外对华投资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发现,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对华投资对于中国本地发展优势促进明显,而来自东亚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对华投资则更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的出口优势^[101]。从溢出效应角度进行分析的研究发现,由于地理邻近和文化邻近,来自港澳台地区的投资对于中国大陆地区整体具有明显的正的溢出效应。而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华投资只对东部沿海地区产生了明显的正溢出效应,来自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对华投资则只对西部地区具有正的溢出效应^[102]。

同样地，中国对外投资目的国的国别差异也会影响其对于中国区域发展的促进效果。研究发现对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更有利于促进中国区域创新发展，因为发达国家可以提供更多的机会来促进中国企业与当地知识密集型公司、竞争对手和大学之间的网络联系，招募受过良好教育和更有经验的当地人才^[103]。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虽然对于区域创新发展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区域产能过剩的矛盾。

4 研究评述与未来展望

4.1 研究评述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双向海外投资规模快速增加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本文分别从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动因理论、中国双向海外投资时空格局以及中国双向海外投资与区域发展三个研究主题对现有研究进行了综述。

(1)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动因。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对于海外投资动因理论的运用范围不同。在海外对华投资研究中，海外投资动因理论主要用于解析其他国家海外投资的空间选择依据，并以此讨论中国各次区域如何强化相关优势吸引海外投资进入。而在中国对外投资的研究中，主要研究内容为构建新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中国对外投资的投资动因。通过引入制度理论和二元性理论等研究视角，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由于投资主体和所处制度环境的差异，中国对外投资动因不仅有着传统海外投资（海外对华投资）的共性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中国对外投资并不完全是在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都建立后所进行的海外扩张，更多情况下是为获取关键资源提升国内竞争优势和实现政治战略意图所采取的重要手段。但是整体来看，现阶段所构建的中国对外投资动因理论研究并没产生全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框架，更多的是对传统对外投资理论的补充和完善^[104-106]。

(2)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的时空格局。近 30 年来，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的时空格局都经历了一个逐渐由高度空间集聚趋向空间均衡分布的过程。但是相关研究对影响两类投资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关注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海外对华投资研究对投资的累积效应关注较多，而对外投资研究对制度关系因子的关注较多。结合经济计量模型分析发现，虽然影响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空间区位选择的因素的种类存在较高相似性，但是同一因素在影响两类投资空间区位选择时所起的作用却存在明显差异。

(3)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与区域发展。整体来看，现有研究普遍发现中国双向海外投资显著促进了区域发展，其中，海外对华投资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技术溢出和关联效应等机制来促进中国各次区域发展，而中国对外投资不仅能够通过投资收益、资源补缺、逆向知识溢出来实现对中国各次区域发展的促进，还可以通过促进税收、增加就业等方式直接促进目的国的区域发展。尽管两种投资对于区域发展的影响机制不同，但二者对于区域发展的影响效果都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4.2 未来展望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为未来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新时代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再思考。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国内要素成本上升明显，加之国际竞争不断加剧，在此背景之下，中国曾经吸引海外对华投资的传统优势区位要素正在逐渐弱化。未来研究可以关注中国区域如何构建新的优势区位要素吸引高质量的海外对华投资进入，例如区域创新环境，开放包容的产业合作机制等。在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应该加强对累积的对外投资示范效应的研究^[55]，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不断增加，中国对外投资的空间分布范围逐渐趋于稳定，在新阶段如何发挥已有对外投资的示范效应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二，双向海外投资活动的空间互动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现有研究多分别讨论对华投资和对外投资如何促进区域发展，但是，结合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中国不仅是全球投资的重要目的国还是全球对外投资的主要输出国。双向投资大规模地在同一地理空间集聚必然会导致二者存在复杂的空间互动关系，而这种空间互动关系还可能会对区域发展产生影响，但是鲜有研究从地理空间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第三，中国双向海外投资与国内投资的空间互动也值得关注。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金融资本仍是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很多企业也面临着融资约束问题，大量资本流向海外必然会造成国内企业融资约束的进一步加剧，而通过海外投资获取全球信息和资源也是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区域发展的必要手段。因此，中国金融资本如何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进行配置以及如何配置，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也值得未来研究给予关注。

参考文献:

- [1]王义源.新常态下中国 FDI 与 OFDI 的特征与发展对策[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S1):299-302.
- [2]贺灿飞, 郭琪, 邹沛思. 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J]. 世界地理研究, 2013, 22(4):1-12.
- [3]胡志强, 苗长虹, 华明芳, 等. 中国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J]. 人文地理, 2018, 33(5):88-96.
- [4]贺灿飞, 梁进社.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异及其变化[J]. 地理学报, 1999(2):3-11.
- [5]李小建. 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变化与中西部地区引资困境[J]. 经济地理, 2004, 24(3):304-308.
- [6]文余源. FDI 理论与区位决策研究述评[J]. 地理科学进展, 2008(2):60-73.
- [7]季颖颖, 郭琪, 贺灿飞.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空间效应及其变化——基于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12):1614-1623.
- [8]王疆, 江娟. 母国集聚与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J]. 世界地理研究, 2017, 26(4):20-30.
- [9]黎明, 夏昕鸣, 朱晟君, 等.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7, 37(11):19-27.
- [10]刘作丽, 贺灿飞.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述评[J]. 地理科学进展, 2009, 28(6):952-961.
- [11]曹广喜. FDI 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J]. 经济地理, 2009, 29(6):894-899.
- [12]Jian L, Strange R, Ning L, et al.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innovation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China[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6, 25(5):1010-1019.
- [13]朱道才, 陆林, 晋秀龙. 空间格局及其经济效应的分析——泛长三角 FDI 实证[J]. 地理科学, 2010, 30(2):184-189.
- [14]贺灿飞, 陈颖. 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空间扩散[J]. 地理科学, 1997(3):2-9.

-
- [15]吴加伟,袁丰,吕卫国,等.金融危机下泛长三角 FDI 时空格局演化及其机制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2014,33(12):1601-1613.
- [16]武剑.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其经济增长效应[J].经济研究,2002(4):27-35,93.
- [17]余慧,贺清云.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与全国各省市的比较[J].热带地理,2007(6):543-547.
- [18]王军,高国威,刘育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世界地理研究,2003(1):23-29.
- [19]高波阳,尉翔宇,黄志基,等.企业异质性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J].经济地理,2019,39(10):130-138.
- [20]王丰龙,司月芳.“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19,28(5):1-10.
- [21]李梅,柳士昌.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J].管理世界,2012(1):21-32,66.
- [22]刘夏明,王珏,逯建.中国 OFDI 的研究综述:理论创新与重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2):86-95,160.
- [23]Dunning J H.Economic analysis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New York:Routledge,1975.
- [24]许罗丹,谭卫红.外商直接投资聚集效应在我国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3(7):38-44.
- [25]江心英.东道国 ESP 系统与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特征研究——以中国为例[J].经济地理,2004,24(4):464-467.
- [26]李国平,杨开忠.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与空间转移特征及其机制研究[J].地理科学,2000(2):102-109.
- [27]Purkayastha S.A comment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OLI framework to emerging economies[J].Global Business Review,2015,16(2):336-340.
- [28]Goldstein A.Multinational companies from emerging economies:composition,conceptualization and dire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M].Springer,2007.
- [29]Rugman A M,Li J.Will China's multinationals succeed globally or regionally?[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2007,25(5):333-343.
- [30]李凝,胡日东.转型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域分布特征解析:基于制度的视角[J].经济地理,2011,31(6):910-914,939.
- [31]Witt M A,Lewin A Y.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s escape response to home country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38(4):579-594.
- [32]Luo Y,Rui H.An ambidexterity perspective towar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from emerging economi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09, 23 (4) :49-70.

[33]Li Y,Cui L.The influence of top management team on Chinese firms'FDI ambidexterity[J].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8, 14 (3) :513-542.

[34]冼国明, 杨锐.技术累积、竞争策略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J].经济研究, 1998 (11) :57-64.

[35]王凤彬, 杨阳.我国企业 FDI 路径选择与“差异化的同时并进”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 2010 (2) :120-129.

[36]明秀南, 阎虹戎, 冼国明.中国 OFDI 的 Linder 假说: 基于二元边际的视角[J].世界经济研究, 2019 (1) :70-80, 136.

[37]Rui H,Yip G S.Foreign acquisitions by Chinese firms:A strategic intent perspective[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8, 43 (2) :213-226.

[38]田晖, 宋清, 楚恬思.制度因素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关系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J].经济地理, 2018, 38 (12) :32-39.

[39]周政可, 梁育填, 周克杨.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进展与展望[J].热带地理, 2019 (6) :942-953.

[40]Luo Y,Xue Q,Han B.How emerging market governments promote outward FDI:Experience from China[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0, 45 (1) :68-79.

[41]Mathews J A.Dragon multinationals:new players in 21st century globalization[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6, 23 (1) :5-27.

[42]Makino S,Lau C M,Yeh R S.Asset-exploitation versus assetseeking:Implications for location choi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2, 33 (3) :403-421.

[43]陈鸿彬.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与对策[J].经济地理, 1993, 13 (2) :50-53.

[44]胡平, 伍新木, 文余源.基于面板数据 SDM 的长江中游城市群 FDI 决定因素分析[J].经济地理, 2014, 34 (1) :15-21, 60.

[45]高菠阳, 郭凌煜, 黄志基, 等.企业异质性、技术关联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策[J].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 (10) :1535-1544.

[46]李郇, 丁行政.空间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实证分析[J].地理科学, 2007 (5) :636-641.

[47]梁育填, 周政可, 刘逸.东南亚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关系研究[J].地理学报, 2018, 73 (8) :1449-1461.

[48]姜海宁.泛长江三角洲 FDI 空间格局演化研究[J].人文地理, 2015, 30 (6) :126-131, 145.

-
- [49]Mariotti S,Piscitello L. Information costs and location of FDI within the host country:Empirical evidence from Ital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5, 26(4):815-841.
- [50]王丽, 曹有挥, 袁丰. 中国 FDI 区位选择的时空格局演进及影响因素分析[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2, 21(1):8-16.
- [51]王钢, 张朝国. 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以温州民营企业为例[J]. 世界地理研究, 2013, 22(2):97-107.
- [52]刘作丽, 贺灿飞, 王俊松. 市场、制度与中国房地产外资企业的区位选择[J]. 经济地理, 2009, 29(9):1512-1517, 1529.
- [53]黄驰, 陈瑛. 2000 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时空演变[J]. 世界地理研究, 2016, 25(2):40-49.
- [54]湛泳, 曾松. 中国对英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J]. 经济地理, 2017, 37(3):19-24.
- [55]周进, 陈瑛, 黎玲君. 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直接投资的时空演变和驱动机制分析[J]. 经济地理, 2018, 38(12):16-24.
- [56]韦燕生, 敖荣军.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劳动力质量因素研究[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8(5):57-60, 83.
- [57]王桂新, 杜淑芬.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城市尺度的面板数据分析[J]. 世界地理研究, 2009, 18(2):38-45.
- [58]范毓婷, 刘卫东. 中国纺织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空间格局[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3):418-426.
- [59]周蓉, 盛强, 汤建中. 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模式[J]. 地理科学进展, 1999(4):330-337.
- [60]王茂军, 徐永平. 中国在美洲 OFDI 的基本特征与决定因素[J]. 地理学报, 2017, 72(8):1373-1391.
- [61]廖小东, 丰凤. 近 10 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异及成因分析[J]. 经济地理, 2012, 32(12):112-116.
- [62]梁育填, 黄慧怡, 刘逸, 等. 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企业所有权差异的视角[J]. 地理科学, 2018, 38(5):645-653.
- [63]陈瑛, 马斌, 来娇娇. 中国民营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子分析[J]. 世界地理研究, 2016, 25(1):67-74.
- [64]刘晓凤, 葛岳静, 赵亚博. 国家距离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J]. 经济地理, 2017, 37(11):99-108.
- [65]唐礼智. 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产业特征[J]. 世界地理研究, 2004(1):35-40.
- [66]许学强, 李胜学.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利用外资的时空差异特征[J]. 地理学报, 1995(2):128-137.
- [67]许和连, 张萌, 吴钢. 文化差异、地理距离与主要投资国在我国的 FDI 空间分布格局[J]. 经济地理, 2012, 32(8):31-35.

-
- [68]陈嘉, 韦素琼, 陈松林. 1991 年来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及驱动机制[J]. 地理学报, 2014, 69(6):838-849.
- [69]沈桂龙. 后危机时期的中国 FDI: 环境约束、变化趋势与政策调整[J]. 上海经济研究, 2010(8):21-28.
- [70]刘荣添, 林峰. 我国东、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差异因素的 Panel Data 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5(7):25-34.
- [71]符文颖, 吴艳芳. 德国在华知识密集制造业投资进入方式的时空特征及区位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17, 72(8):1361-1372.
- [72]袁其刚, 郜晨, 闫世玲. 非洲政府治理水平与中国企业 OFDI 的区位选择[J]. 世界经济研究, 2018(10):121-134, 137.
- [73]He C F, Xie X Z, Zhu S J. Going global: understanding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motiv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J].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2015, 27(4):448-471.
- [74]Kolstad I, Wiig A. 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2, 47(1):26-34.
- [75]冉光和, 徐鲲, 鲁钊阳. 金融发展、FDI 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J]. 科研管理, 2013, 34(7):45-52.
- [76]王然, 燕波, 邓伟根. FDI 对我国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晌及机制——基于产业关联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0(11):16-25.
- [77]赵文军, 于津平. 贸易开放、FDI 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基于 30 个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12, 47(8):18-31.
- [78]侯润秀, 官建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J]. 中国软科学, 2006(5):104-111.
- [79]杜龙政, 林润辉.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省域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18(1):149-162.
- [80]李晓钟, 张小蒂.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及地区差异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08(9):77-87.
- [81]石大千, 杨咏文. FDI 与企业创新: 溢出还是挤出?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8(9):120-134, 137.
- [82]林进智, 郑伟民. FDI 促进内资技术创新产生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J]. 科研管理, 2013, 34(11):27-35.
- [83]罗芊, 贺灿飞, 郭琪. 基于地级市尺度的中国外资空间动态与本土产业演化[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11):1369-1380.
- [84]汪琦. 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及其传导机制[J]. 国际贸易问题, 2004(5):73-77.
- [85]白洁.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经验检验[J]. 世界经济研究, 2009(8):65-69, 89.

-
- [86]刘明霞,王学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9(9):57-62,88-89.
- [87]Child J,Rodrigues S B.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irms:a case for theoretical extension?[J].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2005,1(3):381-410.
- [88]Luo Y,Tung R L.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a springboard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38(4):481-498.
- [89]郭飞,黄雅金.全球价值链视角下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例[J].管理学报,2012,25(3):61-65.
- [90]李梅,金照林.国际 R&D、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1(10):124-136.
- [91]Chen V Z,Jing L,Shapiro D M. International reverse spillover effects on parent firms:Evidences from emerging-market MNEs in developed markets[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2012,30(3):204-218.
- [92]司月芳,陈思雨,Liefner I,等.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研究——基于华为 WIPO 专利分析[J].地理研究,2016,35(10):1869-1878.
- [93]王鑫静,程钰,王建事,等.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J].经济地理,2019,39(8):95-105.
- [94]郑蕾,刘志高.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格局[J].地理科学进展,2015,34(5):563-570.
- [95]沙文兵,李莹.OFDI 逆向技术溢出、知识管理与区域创新能力[J].世界经济研究,2018(7):80-94,136.
- [96]冼国明,严兵.FDI 对中国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J].世界经济,2005(10):18-25,80.
- [97]陈劲,陈钰芬,余芳珍.FDI 对促进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J].科研管理,2007(1):7-13.
- [98]陈岩.中国对外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基于吸收能力的分析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1(10):61-72.
- [99]Chen Y J,Gao Y,Ge Y,et al.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Urban Studies,2015,52(2):358-373.
- [100]Piperopoulos P,Wu J,Wang C Q.Outward FDI,location choices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J].Research Policy,2018,47(1):232-240.
- [101]王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增长和出口结构的影响研究:1983-2006[J].国际贸易问题,2009(6):91-95,112.
- [102]王荣艳.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差异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08(4):24-28.
- [103]Crescenzi R,Pietrobelli C,Rabellotti R. Innovation drivers,value chains and the geography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Europe[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14(6):1053-1086.

[104]Griffith D A,Cavusgil S T,Xu S.Emerging them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8, 39(7):1220-1235.

[105]Seno-Alday 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ought:A 50-year footpri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10, 16(1):16-31.

[106]Buckley P J,Casson M C. The internalisation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a review of the progress of a research agenda after 30 year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9, 40(9):1563-1580.